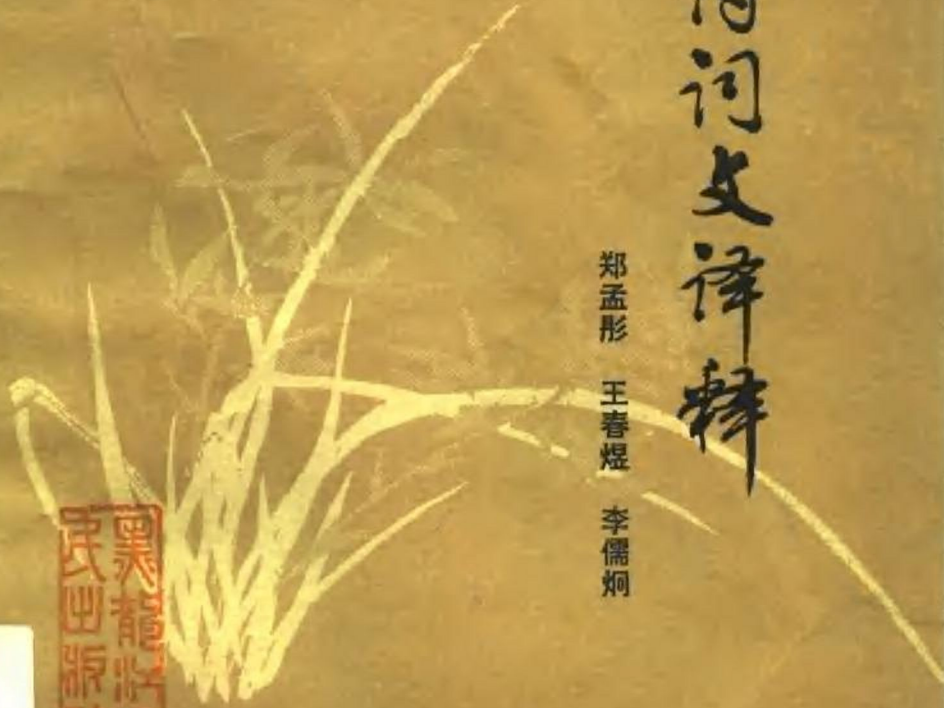


苏东坡诗词文译释

郑孟彤 王春煜 李儒炯



苏东坡诗词文译释

郑孟彤 王春煜 李儒炯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质蕙

封面设计：王祖珍

封面题签：李延沛

苏东坡诗词文译释

Su Dong po shi ci wen Yishi

郑孟彬 王春煜 李儒癸编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38 毫米 1/32·印张 8 2/16·插页 1·字数 193,000

1984 年 10 月第 1 版 198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统一书号：10093·654

定价：1.30 元

目 录

前 言	(1)
和子由澠池怀旧	(16)
游金山寺	(18)
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	(24)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26)
望海楼晚景	(29)
饮湖上初晴后雨	(31)
新城道中	(33)
山村五绝 (选一)	(36)
有美堂暴雨	(38)
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	(41)
百步洪二首 (选一)	(44)
初到黄州	(51)
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	(53)
侄安节远来夜坐	(58)
红梅	(61)
东坡	(64)
海棠	(66)
题西林壁	(69)
惠崇春江晚景	(71)
赠刘景文	(73)

荔枝叹	(76)
澄迈驿通潮阁二首	(82)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85)
江城子	(89)
江城子	(93)
望江南	(99)
水调歌头	(101)
浣溪沙	(108)
浣溪沙	(108)
浣溪沙	(110)
浣溪沙	(117)
永遇乐	(119)
浣溪沙	(123)
西江月	(126)
定风波	(129)
浣溪沙	(133)
洞仙歌	(136)
念奴娇	(140)
念奴娇	(146)
临江仙	(150)
卜算子	(153)
满江红	(156)
浣溪沙	(160)
水龙吟	(163)
贺新郎	(166)
蝶恋花	(170)

教战守	(174)
日 喻	(184)
上梅直讲书	(189)
喜雨亭记	(195)
超然台记	(201)
前赤壁赋	(208)
后赤壁赋	(216)
记承天寺夜游	(221)
石钟山记	(223)
游兰溪	(230)
游白水书付过	(234)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236)
方山子传	(244)
答谢民师书	(249)

前 言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县人。二十一岁（宋仁宗嘉祐二年）考取进士，开始走上仕途。之后的三十多年中，他一直卷在激烈的新旧党争的政治漩涡里。

苏轼早期由于“庆历新政”的余波影响，有要求改革政治的倾向，对豪强兼并的局面有所不满，主张“变政易令”，曾对当时“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等社会政治积弊，提出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是，到了王安石实行变法，他看到来势很猛，操之过急，同他对某些政见有不同，起而反对并多所指摘。他因此出任杭州通判，后又转知密、徐、湖三州。因为他写诗讽刺新法，被捕入狱，谪贬黄州，做团练副使。元丰八年（1085）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当政，起用旧党，他才被召还朝，任翰林学士、侍读、龙图阁学士等官。由于当时旧党完全废除新法，而苏轼在历任地方官过程中，亲眼看到某些新法的实施，确实对人民有好处，因此他对旧党的这种施政方针又持异见，认为不宜尽废新法，从而受到旧党里程颐一派的攻击，被贬出京，知杭、颍、定各州。苏轼对新法这种前后不同的态度，正是宋代社会的重要矛盾在这个敏感而正直的文学家思想中的反映，也是新法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差距的内在矛盾在他思想上的反映。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再度起用新党，他又受新党的排挤，从惠州直贬到遥远偏僻的海南岛儋县。宋徽宗即位，遇赦北归，第二年也就在常州病死了。

苏轼一生辗转在新旧党争之间。他在两党之间的依违态度，必然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同情，这就注定他的悲剧命运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一)

苏轼是一个诗、词、文、赋、书、画无所不能的作家。他对诗、词、散文的革新，都作出了出色的贡献，被誉为北宋文学的巨匠。

苏轼的诗歌成就在北宋时期是最高的。他的诗保存下来的有四千多首，题材很广阔，风格多样化，几乎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进入了他的诗作。他的诗集中，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的作品，虽然所占的比重不大，但那些鞭挞黑暗，传达人民苦难的呼声之作，却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如《荔枝叹》通过汉唐宫廷喜吃新鲜荔枝一事，揭露封建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不顾人民死活，“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真。对此，作者怀着“至今欲食林甫肉”的愤怒，从而联系现实，公开指名谴责当朝权贵“争新买宠”的可耻行径，表现了作者反对苛政扰民和不畏权势的可贵精神。《朱陈村嫁娶图》：“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描绘了农村在官府的横征暴敛下的凄惨景象。《许州西湖》，谴责地方官吏在“许川七不登”的连年歉收的情况下，还大量征用民工，为其“春游”开浚许州西湖：“使君欲春游，浚沼役千掌，纷纭具畚锸，闹若蚁运壤。”《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写对久雨不停，影响农业生产的关怀和对不劳而获、坐享清福的剥削者的讽刺。至于《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虽从反对新法的动机出发，对事实不无夸大之处，但也确实反映了当时人民的一些痛苦，而这正说明了王安石

依靠腐朽的官僚制度推行新法必然产生不少的流弊。

最足以代表苏诗的特色的，是他那些抒发个人情怀和歌咏自然景物之作。虽然它的思想内容往往夹杂着消极因素，但艺术成就高，如《游金山寺》，是作者因反对新法出任杭州通判，经过镇江金山时写的。诗中作者联系自己的思想和身世来描写长江的景物，写得有声有色。看到天寒时岸边潮水涨落的沙痕，便想起江中波涛的惊险澎湃，寄寓着自己在政治上所遭遇的风波。特别是把“江心炬火”设想为江神的见怪，从而渲染出一缕乡愁，流露出对宦游的厌倦情绪，形象生动。《和子由澠池怀旧》写人生的渺小，有如“飞鸿踏雪泥”，只能偶然留下一些爪痕而已。比喻贴切而新颖。“雪泥鸿爪”，终成为成语。结句回顾自己过去生活道路的崎岖，感慨深沉，寓意深远。《有美堂暴雨》写暴雨来前，低雷震地，浓云压顶，狂风急吹，以及暴雨下时，有如千锤急下，羯鼓震天响的迅猛气势，这虽是寻常所见的景物，但在作者笔下，却写得那么生动精警。结句笔锋一转，更是想落天外，面对暴雨，作者想像这是天帝以水洒面唤起谪仙诗，为这场暴雨倾泻出好诗好文。这不仅构思新奇，而且足见作者胸怀的宽广。全诗清丽雄奇，体现了苏诗的自由奔放的风格。《惠崇春江晚景》写早春江南景色。作者善于抓住自然景物因季节变换而出现的新的特征落笔，如桃花三两枝，鸭儿戏水，芦芽冒尖，河豚欲上等，构成了一幅生动的色泽鲜明的江南春色，意境新颖，说出了人们心中似有而又不甚明确的感觉，给人以生机勃勃的美感，激发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又如：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惟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
正是橙黄桔绿时。

——《赠刘景文》

荷尽菊残，已入萧杀的季节；然而点出“橙黄桔绿”，却又给人一

种生意盎然之感，仍然表现出爽朗的精神面貌。此外，如《新城道中》、《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其一、《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一等，都是这类的作品。

苏轼也有一些诗表现了有辩证法因素的哲理。这些诗在宋代哲理诗中颇有代表性，如《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诗通过从不同角度观察庐山都只能看到某一侧面，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看不清庐山的真面目，是因为置身在此山之中。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意思。它通过形象的事物，说明了抽象的道理，有说服力。它如《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每大雷电，但闻云中如婴儿声，殊不闻雷震也》，同是这类的哲理诗。

苏轼的诗，一般都写得流畅、自然、多变化。用苏轼自己的话说，就是“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他的诗常常起得突兀不凡，例如“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有美堂暴雨》）把一场暴风雨的来临，写得令人惊愕。《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一诗，写夏天西湖阵雨，也是突如其来，忽然而去。他的古体尤为纵横恣肆，挥洒自如。

奇特的比喻，高超的想像，是苏诗的另一特点。苏轼写诗很善于运用比喻，他的比喻相当奇特，用“西子”比西湖，是人所共知的了。在《别岁》一诗，把辞别的旧岁，比成游向幽壑的蛇，也是独一无二。而他的《读孟郊诗》连用四种形象来比喻“佳处时一遭”；《百步洪》一连用了七种形象来形容瀑布水势的汹涌，气象逼真，境界不凡，艺术效果很好。这种连用几个比喻来形容一件事物的修辞方法在别人的诗中是很少见的。

苏轼才思横溢，想象力丰富，平凡的事物在他笔下往往出现奇异的形象。他看到江心炬火的奇幻景象，便把它设想为江神的责怪（《游金山寺》）。看到长江，便联想起肥美的鱼（《惠崇春江晚景》）。看到塔上的铃，便设想它会说话（《大风留金山两日》：“塔上一铃独自语，明日颠风当断渡。”）。甚至他在游博罗香积寺时，看到山下的溪水，便想像起水力推磨的形象，仿佛看到磨上像雪花般飞落的面粉，进而想起蒸饼熟透时的裂纹与芳香。这样奇幻的想象，就构成了苏诗的浪漫主义特色。

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也是苏轼诗的一个重要特点。苏轼有些诗，议论发得好，往往蕴含着一种饶有韵味的哲理，如《题西林壁》、《琴诗》等就是这样。但议论发得过分，就会破坏诗的形象性和韵律美；并且容易造成诗歌语言的松散。同时，由于他矜才炫学，他的诗，有些几乎袭用了《庄子》所有的寓言和警句，使得这些作品艰深古奥，枯燥无味。如《观鱼台》：

欲将同异较锱铢，肝胆犹能楚越如。若信万殊归一体，
子今知我我知鱼。

全是谈玄说理，没有什么新的思想。同时，既无鲜明形象，也无诗的意境，读之晦涩难懂，味同嚼蜡。

可以说，苏轼是北宋诗坛上的佼佼者。当时围绕在他周围的有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等所谓“苏门四学士”，或加上陈师道、李廌称为“苏门六君子”，这些人都受到他的影响。他的诗奠定了宋诗的地位，代表了宋诗的风格，为后代许多诗人所推重。金代元好问等人，推崇苏诗，有所谓“苏诗运动”。明代公安派作家十分重视苏轼，借以反对“诗必盛唐”的前后七子。清代钱谦益、宋荦、查慎行等也都推崇苏诗。

(二)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也有很大的成就。他在我国词的发展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词到苏轼，进一步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他把诗文革新运动扩展到词的领域中去。举凡抒情、写景、说理、怀古、感事、送别等向为诗人所惯用的题材，无一不可入词，正象刘熙载所说的：“东坡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艺概》）这就表明了词完全能够表达传统诗歌所容纳的复杂丰富的社会内容，彻底打破了词为“艳科”的保守观念。从而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给词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使词从“樽前”、“花间”走向较为广阔的社会人生。请看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上片写打猎的场面，有炫耀之意；下片才从打猎转入抒写自己的襟怀，表现作者有保卫边疆，杀敌立功的壮志。象这样的题材，在他以前词家的作品里是少见的。而词中所表现出来的慷慨激昂的情怀和豪放风格，也是前所未有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把农村题材引入词中，他的《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是他在谢雨道上看到农村景象，怀着喜悦的心情写的。在它里面既有“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萋罗裙”的农村少女群象，也有“隔篱娇语络丝娘”的缫丝姑娘；既有“道逢醉叟卧黄昏”的醉翁，也有“垂白杖藜抬醉眼”的白发老人，和“牛衣古柳卖黄瓜”的

卖瓜农夫。那里的农村既有“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的热闹场面，也有“垂白杖藜抬醉眼，扶青捣麴软饥肠”的悲惨情景。然而，它毕竟是“麻叶层层繖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是“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是“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的清幽平静的农村气氛。虽然这一切是作者选取了他自己喜爱的材料，渗入了自己的主观感情而创造出来的农村景象，但它终究反映了当时农村的某一侧面，是有其生活气息的。象这样以描摹农村生活入词，在他以前也是不多见的。

历来人们认为最能表现苏词风格的，是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词是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七月在黄州时写的。当时他四十七岁，已经贬谪黄州两年多。他于元丰二年（1079）因作诗文谤讪朝政，八月间被捕入狱。后得张方平，范镇，吴充等人极力营救，才于十二月底出狱。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他受了这次打击后，心情极为沉郁而又错综复杂，一时的悲愤和他平时的旷达交织在一起。作者仰慕“千古风流人物”，赞美祖国壮丽江山，而又慨叹“人间如梦”。这样的思想感情，有它的一致性又有它的矛盾面，融合一起抒发出来，就使全词充满了豪情激荡而又沉郁苍凉的气氛。而全词把抒情、写景和议论熔为一炉，气势流荡跳跃，也就使词显得雄浑奔放。

必须指出，这词上片写得气势雄伟奔放，跌宕有致，确实给读者以境界开阔之感。然而，全词落脚处却是作者的“早生华发”

和“人间如梦”之感，这就使词的境界象从千仞高峰堕入了万丈深渊之中。结尾几句对整首词的高昂豪放的风格，起了一定的破坏作用；在思想上给读者以消极的影响。

苏轼的词也有以爱情为题材的，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词是作者抒发他对亡妻的深切怀念之情的，写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正月。当时他的妻子王弗已去世十年，又是“千里孤坟”，然而，他是多么思念她呀：“不思量，自难忘”。甚至夜来作梦相见，见她“小轩窗，正梳妆”。若是平时王弗的形象不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怎能有此？他俩梦中相见，“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这正深刻地表现出他俩爱情的真挚。如果我们把这词和贺铸悼亡词《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比较来看，就不难看出其爱情思有过之而无不及，说明东坡也是以婉约见长的。婉约派词人大抵着力于抒情的真挚和细腻，苏轼却在真挚和细腻之中渗透着严肃的态度，因而又显得格外凝重和淳厚，与婉约派词带有轻佻之态确实不同。

苏轼还写了好些咏物词，往往借物抒情，也是以婉约见长的。如《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表面上是咏孤鸿“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实质上是他贬官黄州，处境孤寂，而仍自持清高，不与世俗同流的自我写照。全词气氛凄清，情调哀怨。又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咏杨花，《贺新郎·乳燕飞华屋》咏石榴等，都是这类作品。这两首词借助拟人化手法，抒写女主人公的身世飘零、孤独，寄

托着作者在政治上被排挤而怀才不遇的苦闷。词的构思奇巧，刻画细腻，语言清新舒徐，情调幽怨缠绵。就艺术水平来看，苏轼不仅豪放词写得好，他的婉约词也是不亚于任何婉约派词人的。

苏轼对于词的内容的革新，必然相应地引起他对于形式的革新。当时词为了配乐，在音律上过分严格的规则，逐渐成为自由抒情的羁绊。苏轼历来主张文贵自然，不愿以声律害意。所以他的词“往往不协音律”（《易安居士事辑》中李清照《词论》语），人们说他“横放杰出，自是曲子缚不住者”（晁补之语，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正因为这样，有些人把他的词当作“别格”，说“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陈师道：《后山诗话》）。其实，苏轼着重于词的内容，不愿多受形式上的束缚，正是他的革新精神的表现。苏轼不是不懂音律，只是“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陆游语，《历代诗余》卷115引）而已。

苏轼的词在语言上也一变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作风，只要能恰当地表达他的思想感情，任何词语都可入词。他曾吸收陶潜、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也运用当时的口语俗语入词，从而形成了一种清新朴素、流利畅达的诗歌语言。所有这些，都表现出豪放词派的特点。可以说，苏词的出现，就有力地冲击着词坛上从晚唐、五代以来的婉约派作风，成为后来豪放派词的开创者。

（三）

苏轼的散文，向来同韩、柳、欧三家并称，以平易自然、文从字顺为特点。和当时的士大夫们，“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大异其趣。他主张文章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就是要自由表达内容，不

要受种种形式上的拘束。由于他学问渊博，生活经历丰富，而又有高强的驾驭语言的能力，所以能纵横自由、准确生动地抒写出所要表达的意境，使他的文章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见《文说》），而“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形成他的雄浑豪放的独特风格。

苏轼的奏议和历史论文，基本上都是宣扬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佛老思想的。这两者虽然是对立的，但在他的世界观里却得到矛盾的统一，因而在他的政治论文中也往往混为一体。他的这类政治论文，大都从儒家政治理想出发，广引历史事实加以论证。写得洋洋洒洒，纵横恣肆，说理透辟，气势雄浑，如《策略》二，他反对在侵略者面前屈辱求和，说“岁出金缗数百万以资强虏”是“最下之策”，并提出了一些针对时弊的改革军制，巩固国防的办法。应该说，这在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已逐渐形成、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深刻化的时代，是有其现实意义的。《留侯论》中对刘邦最后打败项羽、一统天下的原因，仅仅归结于个别历史人物的作用，当然是不正确的，但他对传说黄石公赐书张良的故事，能够扫除其神奇以至迷信的色彩，回到人事上来找原因，突破了当时流行的天命论，是颇有见识的。至于他在《较赋役》里指出“有兼并之族而赋甚轻，有贫弱之家而不免于重役，以至于破败流移”；《敦教化》中说：“百工杂作，匹夫入市，操挟尺寸，吏且随而税之，扼吭拊背，以收丝毫之利”，“天地之间，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都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当时土地兼并和赋役不均的社会现实。但是，其中也有些是不切实际，流于空泛的。如他的《商鞅论》，认为商鞅变法是破国亡家之术，把进步的东西说成是落后的。《劝亲睦》主张恢复小宗来劝导人民亲睦，也是不审察情势的倒退之说。这类文章虽然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但在内容上没有什么意义。至于他的《上皇帝书》、《再上皇帝书》、《论

时政状》等篇，对王安石实行的新法，进行种种攻击，更是不合时宜的了。

在苏轼的散文中，书札、杂记、杂说、小赋等的成就要远在他的政治论文之上。这些作品都带有较强的文学性。作者往往是随笔挥洒，夹叙夹议，表现了他的广阔胸怀及其对人生对文艺的见解和爱好。先谈他的书札。《上梅直讲书》抒写作者感恩之心和得意之情。当时苏轼以默默无闻的一介书生，入京应举，得到考官的识拔，名噪士林。所以他以万分兴奋的心情，向梅尧臣上此书，劈头就叹周公不遇，赞孔子得贤，体现出作者心阔志远，接着叙对欧、梅二人由来已久的倾慕；进而写自己突然受到当代名流的知遇。写来墨飞笔舞，淋漓酣畅，快慰之情，倾注毫端。全篇烘托出一个“乐”字，而毫无拘谨忸怩之态。又如《答谢民师书》，是苏轼于元符三年（1100）由海南北返，时谢在广东做官，以文相见，畅谈甚欢。分别后，苏轼给他写这封信，表白自己的文学见解。书中通过对谢文章的赞扬，提出作文要顺之自然，“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要做到“辞达”。而要做到“辞达”，就需要作家对事物的特征有深刻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也就是要“了然于心”，也要“了然于口与手”，这样才能把事物的情状和事情的道理生动透彻地表现出来。他从这观点出发，批评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并指出扬雄的《太玄》、《法言》，是雕虫小技；而屈原的《离骚》，因“风雅之再变”，所以“可与日月争光”。这里作者通过具体作品的评述，说明了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苏轼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有一定的道理。

苏轼的碑传之作，虽然不多，但也很有特色。他的《方山子传》巧于剪裁，善于提炼，避免了一般传记文对人物生平的详细叙述，只在首段极其概括地点出方山子少、壮、晚三个时期的主要行实之后，就着重写其游侠、隐居、安处贫贱等二、三事，便